

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文明 与 生物

进化论对20世纪之交
美国女性小说的影响研究

Civilization
and Biology

潘志明 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一般项目资助

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文明与生物

潘志明 著

进化论对20世纪之交
美国女性小说的影响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与生物：进化论对 20 世纪之交美国女性小说的影响研究 / 潘志明
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10

(外国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135-9518-6

I. ①文… II. ①潘… III. ①妇女文学—小说研究—美国—20 世纪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7179 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李旭洁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2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9518-6
定 价 56.00 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295180001

“外国文学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金 莉

编委会（按姓氏拼音排列）：

曹顺庆	程 巍	冯亚琳	高继海	韩瑞祥
李铭敬	林丰民	刘意青	马海良	聂珍钊
秦海鹰	任卫东	孙晓萌	陶家俊	汪剑钊
汪介之	王炳钧	王 成	王丽亚	王守仁
王晓路	颜海平	虞建华	张 冲	张 剑
张中载	朱 刚	邹兰芳		

丛书总序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策划、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丛书”就要与读者见面了。近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界同仁一直在积极探索有效途径，提升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增强我国学者的国际学术话语权。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专门策划了这套外国文学研究丛书，旨在将我国学者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最新优异成果及时介绍给国内学者，也希望以此丛书，促进我国学者与世界同领域学者的学术对话，借此提升我国外国文学学科在世界学术界的影响力。

“外国文学研究丛书”定位于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以中文撰写的外国文学研究专著。这是一套开放性丛书，范围包括以下五个方向的内容：外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经典作品与作家批评、比较文学理论与批评、外国文学史研究、文化批评研究。高等研究院邀请了国内知名学者加入编委会，向我国外国文学界学者征集研究书稿并参与审稿。

近年来我国外国文学学者中学术造诣深湛之人很多，他们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外国文学作品与作家、理论与思潮、历

史与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精到的解读。在世界文学格局不断发生变化的今天，他们的研究为我们了解外国文学的发展进程打开了一个窗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套丛书，展示他们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也为广大的研究者提供一个学习、对话、交流的平台。相信他们的著作将为读者带来思想的震撼、精神的启迪和阅读的快乐。

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我国诸多外国文学学者的鼎力相助和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全力配合，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北京外国语大学 金莉

2017年7月18日

本书序言

潘志明于2004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在我的指导下攻读“美国小说”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他肯读书，会读书，读书快，读得细，读得多，往往是超额完成课程要求的读书数量，还能写出几十页的“小论文”，这一点在我的博士生群体里是人所共知的，也是大家所羡慕和敬佩的。2007年他如期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得以留在北外英语学院任教，2009年晋升为教授，2013年又获得了博士生指导教师资格，可谓勤奋好学，学有所成。在认真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他也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进化论对20世纪之交美国女性小说的影响研究”获得了教育部的科研立项并已顺利结项。

一天晚饭后，志明拿着300多页的一沓书稿来敲我家的门，说他的“小书”即将付梓，想请我写个序言。我接过书稿一看书名是《文明与生物》，知道这是他数年奋斗终于完成的教育部科研项目的结项成果，作为他曾经的导师、现在的同事和邻居，看到他又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我自然高兴，于是欣然接受。

志明的《文明与生物》研究的是进化论对20世纪之交美国女性小说

的影响。说到进化论对美国小说的影响，我们通常想到的是美国的自然主义小说，想到美国自然主义小说中的悲观情绪和控制底层民众生活的环境、遗传、本能、巧合等非道德力量。就美国自然主义小说而言，这样的理解基本符合事实。不过，就进化论的影响而论，这样的理解就不无问题了。首先，就其本质而论，美国自然主义小说的两个进化论源头分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它与两者之间似乎并不是直接对应的关系。实际上，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否认道德在自然选择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人类文明的前景也并不悲观。其次，进化论对于美国的影响十分深远，对美国小说的影响也绝不仅限于自然主义小说。尽管美国主流社会和学术话语对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抱有怀疑和抵制的态度，但达尔文的进化论最终通过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高尔顿的优生学影响到了20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也广泛地反映到了美国文学之中。其实，进化论之于美国小说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即使是那些通常不属于自然主义文学范畴的小说作品也有着进化论的成分，而且这样的成分往往并不逊色于美国自然主义小说中的进化论成分。再者，进化论之于美国小说的影响并非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其中往往既有接受和肯定，又有质疑和回应。实际上，对有些小说家来说，进化论只是为他们提供了审视美国社会现实的一个视角，并不一定代表着他们就是进化论的信奉者，也不一定说明他们有意通过作品倡导或宣扬进化论世界观。

《文明与生物》聚焦于20世纪之交的美国女性小说，审视进化论——主要是达尔文进化论——对朱厄特、华顿、格拉斯哥的影响。这三位女性作家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作家，但三者都使用了进化论的视角观察和分析她们笔下的人物和社会。朱厄特的作品文笔温馨，虽然没

有自然主义作品的悲观和宿命色彩，但也充满着相互冲突的进化论观念和视角。无论是其从进化论遗传和变异的角度所描写的个人、家庭和性别问题，还是其从种族化遗传的角度对社群、地域、民族、国家所作的剖析，都包含着肯定和质疑的声音。华顿的作品整体上所描写的大多是上流社会的风尚变迁。她把上流社会成员视为人类文明进化进程中的部落群体，关注进化论道德观之于这个群体以及群体成员的意义，批判的是上流社会轻浮和虚伪的道德观，因而完全不同于自然主义小说的非道德观。格拉斯哥的作品大多从进化论遗传观的角度考察人物和社会，但她把自然主义称为文学唯名主义，并不认可自然主义文学描写现实的手法。在格拉斯哥看来，人必须在人性和人类之间取得平衡，既不应放纵人性，使人成为为生物学属性所主宰的动物，又不超越人类的进化进程而过分强调人类和文明。

在《文明与生物》中，作者穿梭于社会现实、历史语境、作者生平和作品文本之间，杪芒微会，细心求证，每每于字里行间有惊喜的发现和独到的见解。例如，在第一章第二节中，作者不仅从朱厄特《尖枫树之乡》中的细节描写中解读出不同的宗族和种族观念之间的冲突，而且还从作为外来者的叙事人融入伯顿家族聚会的事实中发现超越宗族和种族的可能性，从而以充分的文本证据修正了一个时期以来研究者对朱厄特种族观念的批评。再如，在第二章第三节中，作者为了廓清华顿的种族观念，重新解读了华顿的盖茨比信件，证明华顿虽然在信中把《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犹太人沃尔夫谢姆称为菲茨杰拉德的“完美的犹太人”，但这并非真正的赞美。接着，作者详细分析了达尔文的人类种族同源论，并以此为依据深入解读《欢乐之家》的情节安排、人物刻画、叙事视角之中所隐含的种族观念，从而令人信服地说明华顿并非反犹主义

作家。还有，第三章第二节在讨论《生活与加布里埃拉》时，论及女主人公位于纽约西二十三街的住所，并在注释中指出富甲一方的华顿的娘家就位于这条街上，且格拉斯哥还在作品中提到这条街上住着“一位著名却并不流行的小说家”。借助于这个并不起眼的注释，作者清楚地说明了女主人公人生的成功和经济状况的极大改观。

《文明与生物》缘起于志明的博士学位论文《作为策略的罗曼司》中的一个注释，可以说是对那个注释的注释，所以作者称之为“小书”似乎也无不可。不过，这本书的撰写花了他近6年的心血，涉及大量的作品和文献，其实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尤其是，志明习惯于从小处入手，梳篦文字，簪别要义，个中的辛苦当然也就可想而知了。教书、读书、写书，艰辛尽人皆知，对于读书细、细读书、重考据、爱较真的潘志明来说更是不言而喻！在撰写《文明与生物》这本“小书”的6年里，其中有两年志明是住在远离学校的北六环的一个小区里，从住处到北外来回一趟有时需要4—5个小时，风里来雨里去，披星戴月，这无疑又为这部专著增添了些许奇异的色彩。

志明是个闲不住的人，也是个爱钻研的人，《文明与生物》是他近几年来为美国文学学界奉献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也是他在科研道路上另一个阶段的开始，我期待着他下一个成果的出现，届时我还乐意为他作序。

北京外国语大学 郭棲庆

2016年12月26日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关于人性的文献：朱厄特小说中的遗传和变异 / 13

一、关于人性的知识 / 20

二、种族化的遗传 / 42

第二章

进化论的阐释者：华顿小说的进化论道德观 / 81

一、进化论的虚伪诠释者 / 84

二、华盛顿广场的道德秩序 / 100

三、“十全十美的犹太人” / 137

第三章

南方的问题：格拉斯哥小说对社会历史的生物学阐释 / 171

一、失败者：格拉斯哥的进化论实验 / 181

二、失败的成功者：进化论背后的经济 / 224

三、以种族的立场思考 / 248

结 论 / 315

参考文献 / 319

绪 论

1859年，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发表《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在该书绪论的最后，达尔文说：“虽然许多问题至今还说不清，而且还将长期说不清，但经过我能做到的深思熟虑的研究和冷静的判断，我毫无疑问地认为，多数博物学家所持的观点以及我从前所持的观点——每一物种都是独立被创造出来的观点——是错误的。”接着，他提出了新观点：“我完全相信物种并非不变的；我们所谓的同属物种是某一其他已经普遍灭绝的物种的直系后代，正如任何人们公认的物种的变种乃是该物种的后代一样。再者，我相信，自然选择是变异的主要但又并非唯一的途径。”（*Origin* 6）¹

对于达尔文来说，《物种起源》所提出的自然选择的进化法则已经足以说明多种起源论、神创论等生物学或宗教有关世界和物种起源的观点是“错误的”。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再出版他多年来一直收集的有关人类起源的笔记。在他看来，出版这些笔记只会增加人们对其观点

1. 本书所有译文如无特殊说明，都为作者所译。

的“偏见”。然而，1871年，他还是出版了《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对于其中的原因，达尔文的说法是，虽然“为数不少的博物学家”已经接受了自然选择法则，但“更多的人”认为他“过于夸大了其重要性”，而“自然科学界老一代受人尊敬的泰斗们”之中仍然有许多人“反对任何形式的进化学说”。达尔文说，“考虑到大多数博物学家现在所持的观点”，而这样的观点“就像任何事例一样”，“会有人追捧”，所以他才“把收集的笔记整合起来”，以检验《物种起源》中得出的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能“运用到人类身上”（*Descent*, vol. 1: 1-2）。从“为数不少的”、“更多的”、“许多”等词语看，“大多数博物学家现在所持的观点”应当是反对自然选择法则的观点。换言之，达尔文之所以出版《人类的由来》一书，原因在于大多数人反对他提出的自然选择法则，特别是这些人认为这一法则无法解释人类的起源问题。这就解释了《人类的由来》一书的标题与其内容的不一致。按理说，“人类的由来”这一标题指的应当是人类的起源，但该书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达尔文反其道而行之，在该书第一卷中首先讨论人类的智力、道德、种族的起源，而在第二卷中才通过观察从低到高的生物形态，解释性选择在人类种族的起源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身处21世纪初的人们看来，达尔文有关自然选择的话也许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而他为出版《人类的由来》所提出的理由也大可不必。今天的人们已经处于一个量子、纳米、黑洞、引力波的时代，很难想象自然选择的进化法则之于维多利亚时代的革命性意义，很难想象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对神创论、设计论证、目的论世界观的冲击，难以理解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何以会引起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论争，也很少去考虑这一理

论何以在其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以或正或反的方式深刻影响人类生活，改写人类历史。实际上，对于当今直接或间接受过达尔文进化论理论熏陶的人们来说，已经很难重新构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法则提出之前西方社会看待世界的方式，因为他的进化理论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人类对于自身以及周围世界的认识。

今天的人们也许不再纠结于自然选择的法则对于我们的意义。然而，对于1859年之后近一个世纪的人们来说，自然选择的法则意味着许多超出我们想象的影响。这一法则及其推论意味着人类不是上帝创造的，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并不一定是进步的，意味着自然和社会就是物种的竞技场，意味着人生就是一场生存斗争，意味着世界是由强者主宰的，意味着弱者是要被消灭的，意味着胜败与道德、善良、美丽、公平、正义无关，意味着地衣说不定是比人类还要顽强的生存者。虽然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把道德情感以及同情心引入到有关人类进化的讨论中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自然选择法则之于人类文明的意义，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所处的这个世界的生物学/动物性本质。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楚地从《人类的由来》的结论中看到：“人类为达到了生物进化的巅峰而感到有点自豪，即使并非通过其自身努力，那也情有可原……在我看来，我们必须承认，尽管人具有其所有的高贵品质，具有对最低下者的同情心，具有惠及他人及最卑微生物的仁爱之心，具有神一般洞悉太阳系运动和构成的智慧，具有所有这一切为人赞叹的能力，但人的躯体上仍然带有其低级起源不可磨灭的印记。”事实上，尽管达尔文承认人类的道德品质不仅仅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但他仍然相信人类之所以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原因还在于“随着迅速繁殖而来的生存斗争”。按照这一逻辑，人类如果要达到更高的水平，就不能

通过“任何手段”降低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Descent*, vol. 2: 403-405）。

尽管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法则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论争和抵制，但它也很快通过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高尔顿（Francis Galton 1822-1911）的优生学影响到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斯宾塞把自然选择的法则改造成适者生存的经济和社会理论，反对人为干预自由竞争。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启发，高尔顿提出了优生学，认为人的优秀品质是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这一理论在20世纪初对一些国家的人口和种族政策——特别是美国的优生学实践和移民政策——影响深刻。

由于美国的种族特殊性，美国学术界和政界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本身总体上抱着抵制的态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美国考古学、人类学、生物学界流行的是人类种族多源论，因而对达尔文进化论所坚持的人类种族同源论一直持怀疑和抵制的态度。比如，哈佛大学教授阿加西兹（Louis Agassiz 1807-1873）坚持神创论，反对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认为人类各种族的起源并不相同；在他看来，《圣经》只是以犹太人为参照讲述了上帝创造白人的故事。部分地由于阿加西兹的巨大影响，直到1925年美国主流社会仍然不认可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同年的“猴子审判案”看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美国学术界和主流社会反对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但这一理论最终通过优生学对美国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由于由来已久的种族歧视，另一方面也由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量少数民族裔的涌入，以及同一时期美国经济的萧条和白人女性生育率的下降，优生学的人口主张很快被美国主流社会和学术界接受，形成优生学

运动，并进而在20世纪初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一是对囚犯等不适合人群的强制性绝育措施；这期间，先后有33个州通过优生法令，造成6万人被强制绝育（“Image Archive”）。二是控制少数族裔移民和禁止白人种族与少数族裔人群间的通婚；其高潮则是1924年通过的移民法。美国的优生学理论和实践继而传播到纳粹德国，成为推动纳粹德国种族清洗的重要原因。

美国文学与达尔文进化论及以此为基础的推论之间的互动则主要反映在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之中。在达尔文进化论、社会达尔主义以及左拉（Émile Zola 1840-1902）的自然主义文学观念影响下，美国文学在1890-1930年间呈现出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产生了克莱恩（Stephen Crane 1871-1900）、诺里斯（Frank Norris 1870-1902）、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 1871-1945）、杰克·伦敦（Jack London 1876-1916）等自然主义作家。这些作家虽然各有特点，但总体上往往以冷峻的笔触和悲观的色调描写非道德的力量和人物的本能冲动，展示宿命和巧合因素在中下层阶级人物行为和命运中的作用。

以传统的标准来衡量，20世纪之交的美国女性小说家及其作品也许并不属于自然主义文学的范畴，但包括达尔文在内的进化论学者们对这一时期美国女性小说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事实上，已经有不少研究者试图把这一时期的一些美国女性小说与自然主义文学联系起来。例如，沃克（Nancy Walker）认为，虽然艾伦·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 1873-1945）并不喜欢人们把她与自然主义文学相提并论，但其早期作品《后代》（*The Descendant*, 1897）和《劣等星球相位》（*Phases of an Inferior Planet*, 1898）“呈现出〔她〕与19世纪90年代其他自然主义作家之间明显的联姻关系”（134）。类似地，坎贝尔（Donna Campbell）也认为我

们只要对现有的自然主义理论“稍作重新定义”，就可以把华顿（Edith Wharton 1862-1937）、格拉斯哥、凯瑟（Willa Cather 1873-1947）、肖邦（Kate Chopin 1850-1904）等美国女性作家归入自然主义文学的范畴。（167）

从总体上看，各种进化理论与20世纪之交的美国女性作家之间确实存在着影响和互动关系。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1860-1935）虽然不一定读过达尔文的著作，¹甚至都没有在《女性与经济》（*Women and Economics*, 1898）中提及达尔文的名字，但她一再使用进化论术语阐述其性别经济理论。比如，吉尔曼在该书中论及自我保护和种族保护之间的区别时说：“在自我保护方面，自然选择作用于个人，培养起那些使之能够在‘生存竞争’中成功的特征，并使之通过使用促进那些有益于其自身的器官和功能。在种族保护方面，性选择作用于个人，培养那些使之能……在‘为了他者的生存竞争’中成功的特征，并使之通过使用而增强那些直接或间接有益于其后代的器官和功能。”（34-35）不管吉尔曼是否读过达尔文的原著，这两句话中的核心概念——“自然选择”、“性选择”、“生存竞争”、“使用”——都源自《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在很大程度上，吉尔曼只是把达尔文的理论运用到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讨论之中，为女性争取平等的权利。与之相比，优生学和美国主流种族话语对吉尔曼的影响要负面得多。通过家谱研究，她认为她自己是英国王室的后代，因为其祖先可以追溯到征服者威廉，（Weinbaum 275-276）并强调她“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人”（Davis 228）。此外，她还断

1. 戴维斯（Cynthia Davis）认为，吉尔曼的“进化论知识大多是从他人那里得来的”，因为她不是直接“阅读达尔文的著作”，而是通过阅读其他人的著作了解进化论的。（189）